

拡大) (漢族之移民及擴張), 上水流久彦的 (臺灣漢人之同姓結合にみる柔軟性) (台灣漢人之同姓結合現象的靈活性), 森川真規雄的 (逍遙する味覚) (味覚逍遙), 山中弘等的 (マレーシア華人社會における宗教の諸相)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宗教活動面面觀), 増田Ayumi的 (シンガポール多民族主義と中國系の人々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新加坡多元民族主義與華裔之身份認同), 川上鬱雄的 (オーストラリアにおける「中國系移民」の新しい動き) (澳大利亞中國移民的新動態), 小野澤Nitsutaya的 (中國系タイ人のエスニック・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泰國華裔的族群身份認同) 等七篇論文。各篇論文所涉及的題目以及論點各不相同, 因篇幅所限筆者在此無法對每篇論文之詳細內容加以評論, 而僅指出整本書籍的結構方面的問題。據編者序言, 貫穿本書的關鍵詞為「人口移動」與「文化創造」。雖然各篇論文都多少涉及到這兩個關鍵詞, 但如何分析「文化創造」, 該書未能提供給讀者任何貫穿整書之理論框架。首先, 雖然編者使用「創造」一詞, 但除陳志明文章之外的論文幾乎都未討論「創造」文化的主體到底是誰, 這一主體有時為一民族, 而有時為組織人員。再者, 編者僅用「文化創造」一詞來分析該書所包含的各種文化現象, 然而「文化創造」當然不是單一的文化現象。正如各篇論文所論及的個案, 去領域化的移民社會裡所產生的文化是人口、知識、資金、意識形態等不同層面個別流動交叉而形成的。筆者認為只有經過分析各層面之間的離接與差距, 方可以將各篇論文中所提到的移民社會中的文化現象加以比較研究, 並可以將文化的創造等問題放在較大的視野中來探討。此書為讀者提供了了解人口移動與文化動態的豐富資料, 頗具價值。然而, 比較研究移民社會所產生的文化現象並由此歸納出文化創造的動態理論這份工作, 或許要留待讀者自己來進行。

木村自

(日本) 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Edited by LYNN A. STRU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xiv, 412pp.**

大約在1970—1980年代, 「帝國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 開始成為美國漢學界用以指稱中國晚明至清代這一時期的流行術語, 時段大致從16世紀

下半葉到整個19世紀。與此同時，「中國中心觀」的觀察視角也興起，即更多地從中國自身社會與文化的原動力出發，來考察其變遷。近年來，「帝國晚期」和「中國中心的歷史」這兩個說法都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前者因為在語義上具有濃厚的將清代視為緩慢、遲滯發展階段的隱喻，而引起巨大的爭議；後者則被指責割裂了這一時期中國的發展與更廣闊的亞洲史和世界史的聯繫。《世界歷史時間中清的形成》，正是將通過不同視角反映這樣一些問題的論文收錄而成的一部論文集。

1999年6月，在印地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召開了「世界史與中國史時段中的清代形成」（“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 and Chinese Time”）研討會，會議論文由印地安那大學歷史系司徒琳（Lynn A. Struve）教授主編，分為兩部結集出版。本書是其中一部，另一部名為《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從明到清時間的重塑》（*Time, 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 Edited by Lynn A. Struve. Honolulu: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本書篇首是司徒琳的引論，但並非一般的序言。她不是簡單介紹本書編輯緣起及各篇文章的大意，而是從非常宏觀的理論視野出發，對該書各篇文章涉及的不同問題背後的學術史脈絡，進行了高度概括的梳理。因此，該引論也就成為理解本書深意的關鍵所在。討論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層次：

一是如何理解「清代形成」（Qing formation）？司徒琳認為，本書選擇「清代形成」作為標題，而非「清初」（early Qing）或「清的興起」（rise of the Qing），正是希望刺激研究者思考歷史進程而非時期片段、思考那些進程採取或產生的形式。她借用弗萊德·斯皮爾（Fred Spier）的「體系」（regime）概念，強調應該將清代的形成理解為滿洲的體系不斷地與東亞同時代的其他體系，比如中國本土的、朝鮮的、蒙古草原的、西伯利亞的和東南海洋地區的體系進行互動的過程。

二是關於時間框架的問題，即「清是什麼時間」（What time is Qing）？編者考察了西方漢學界以及中國、日本歷史學界對於「明清時期」（Ming-Qing period）在歷史時間中的定位的不同觀點，包括王朝周期體系（dynastic cycles）、「帝國晚期」（late imperial）、「早期現代」（early modern）在內的幾種主要的分期概念，並對各種分期術語背後的學術史脈絡以及政治、文化背景加以分析。其中，「早期現代」是該書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而各篇文章的作者在本次會議上也對這一術語的用法產生了極大的爭論。編者始終強調，這些爭論不僅僅是語義上的，更有着深刻的歷史觀念背景。她認

爲，反思這個分期標籤的意義可能在於「去」世界歷史近500年的「歐洲中心化」。

本書收錄的文章也是按照上述兩個層次的內容分成上下兩編的。上編爲「歐亞時段中的定位」(Siting in Eurasian Time)，主要討論如何在歐亞時空體系中理解清的形成，收入文章共四篇：濮德培(Peter C. Perdue)的〈歐亞時空裡的清帝國：噶爾丹之戰的教訓〉(The Qing Empire in Eurasian Time and Space: Lessons from the Galdan Campaigns)；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的〈清的形成、蒙古的遺產，及現代早期歐亞大陸中部的「歷史的終結」〉(The Qing Formation, the Mongol Legacy, and the “End of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Central Eurasia)；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的〈與槍炮何干：火器和清帝國的形成〉(Did Guns Matter? Firearms and the Qing Formation)；以及衛思韓(John E. Wills, Jr)〈偶然的聯繫：福建、中華帝國與早期現代世界〉(Contingent Connections: Fujian, the Empire, and the Early Modern World)。

濮德培與米華健都關注發生在17至18世紀所謂「草原帝國衰落」的新時代。前者圍繞以《平定朔漠方略》爲代表的各種關於康熙平定噶爾丹之役的歷史記錄，考察清朝皇帝、官員和蒙古人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把這一衝突置於歷史時間之中。作者將視野延伸至後來的歷史學家如何將此事件與20世紀中國民族主義觀念聯繫起來。通過這樣的考察，他將清朝對西北的征服納入到整個歐亞大陸在17到18世紀的帝國拓展與殖民事業中。後者則將目光投放到乾隆中期土爾扈特餘部回歸清朝版圖的歷史事件，並將之與當時中國周邊的一些歐亞地區進行對比，如烏孜別克、西部蒙古、東部蒙古等地區，認爲清帝國的形成是蒙古帝國於15世紀初分崩離析之後，整個中亞和內亞各個區域發生的「再中央集權化」(recentralization)和「再帝國化」(reimperialization)過程的幾個案例之一。

狄宇宙關注從西方傳入中國的火器技術在明清之際的戰爭裡被如何運用，以及在清代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他發現火器技術傳入中國後，並未改變龐大並且已很先進的明代國家，而是向較小且能迅速適應的滿洲擴散，並對清初國家結構和效能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作者試圖擺脫以西方經驗爲參照物得出的關於歐洲火器在16世紀到17世紀的中國傳播的一般看法，而是將這一過程放到當時中國的具體情境中進行重新考察。

衛思韓以福建爲例，集中討論在清代形成過程中，帝國中心與帝國各區域之間的關係，並將清初與同時期歐亞的一些帝國相比較。他發現，福建在南明政權覆滅後，海上貿易被鄭氏控制，成爲與清政權離心的力量，卻最終

並未建立獨立的國家。由此，他認為中國與歐亞許多帝國的明顯不同之處在於，地方與中央的緊密聯繫，即儘管存在明清易代的劇烈動蕩，省作為帝國的一個可靠和順從的單元，仍具有持久性和最後的支撐力。

下編題為「清前期是『早期現代』嗎？」（Was the Early Qing “Early Modern”?），幾位作者都將「早期現代」作為討論清代形成的一個重要工具，從不同角度或宏觀或微觀地進行了比較研究。此部份也包括四篇文章：羅友枝（Evelyn S. Rawski）〈清的形成和早期現代〉（The Qing Formation and the Early-Modern Period）；金世杰（Jack A. Goldstone）〈既非帝國晚期，亦非早期現代：治世與世界歷史中清的形成〉（Neither Late Imperial nor Early Modern: Efflorescences and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 History）；喬迅（Jonathan Hay）〈清初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的歷時性探討〉（The Diachronics of Early Qing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司徒琳（Lynn A. Struve）〈捉摸不定的早期現代性：以遺民文集為個案〉（Chimerical Early Modernity: The Case of “Conquest Generation” Memoirs）。

羅友枝列舉了大量關於早期現代的研究成果，她指出近來此類歷史著作中有關亞洲的部分，主要的篇幅多集中在東南亞和日本，而不是中國。她從稅收的增長、領土的鞏固、行政機構的中央集權化、文化的統一等方面來分析清代形成過程中出現的早期現代的特徵。

金世杰將清朝與黃金時期的荷蘭、中世紀鼎盛時期的北歐和18世紀的英國相比較，認為從總產出的宏觀增長水平來看，在1680—1780的一百年間，清朝的發展歷程在各個方面都能夠與之相媲美，達到了前工業化世界能夠達到的最高水平。他採用「花期」（efflorescence）一詞來描述進步與衰退的周期性轉換，並認為這種轉換是文明發展的一般過程，清代的這種轉化與工業革命時期的歐洲、德川時期的日本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喬迅從清初的視覺與物質文化的角度探討了早期現代作為討論清代歷史的時間框架的有效性。他通過考察清初建築、陶瓷、繪畫三個不同領域的成就，認為應該將劃分時期的術語用作「光學透鏡」（optical lens），交替使用它們，來關注歷史現象的不同維度。在研究清初的視覺文化時，他發現早期現代的透鏡的效用，勝過了王朝體系和帝國晚期。

司徒琳以明末清初的遺民文集為考察角度，質疑了喬迅的觀點。她認為清初士人在感受今昔關係時，對那些意義深遠的變革並沒有看清，自我寫作中的主體性也沒有被強化。而這些都被視為早期現代的重要特徵。因此，她認為與其構建一個早期現代的敘事，毋寧把在16世紀末到18世紀初的中國文

化中看到的令人震撼的東西，看作是一個有着自己節奏和軌跡的文明的內部變化。

本書作為會議論文集，所收各篇論文在選題上不盡相同，但是都試圖從更廣泛的亞洲史和世界史的視野中重新思考清代形成的歷史過程，以及怎樣在世界歷史時間中定位清代。但是，將清代的形成放進世界歷史的整體維度中進行思考，恐怕仍然需要在從「中」看「西」與從「西」看「中」的雙向時空視角中尋找一種更多元的平衡。這樣的平衡可能需要更多地考慮中國社會的區域性特徵，更多依賴大量深入細緻的區域社會史的研究成果。而能夠以中國某一特定區域的深入研究來回應這些大問題、老問題的文章，在本論集中數量並不多。同時，真正拋棄那些含有過多或隱或現的政治隱喻和對某種社會狀態的預設的分期概念，恐怕還需要假以時日。畢竟，在該書中我們並沒有看到一種替代性概念的出現。爭論還將繼續下去，但是，爭論本身至少可以刺激學者考慮使用更開放而非關閉各種可能性的分期標籤來替代諸如「早期現代」這樣的術語。我們應該更多思考的是，作為中國歷史學者，我們該如何以自身的研究參與乃至超越他們的討論！

鄧慶平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劉文鵬，《清代驛傳及其與疆域形成關係之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4，3，338頁。**

本書是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清代疆域形成研究」計劃的專著之一。作者在緒論中指出，學界對清代驛傳系統的研究並不充份，「因襲明代說」雖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並不能反映出清代驛傳系統在「存在範圍、構成內容、管理方式、財政供應等方面」獨有的特點，尤其是該系統在邊疆地區的發展，是其超越明代的特色之一，但以往學界對此關注不多。故作者力圖將二者綜合觀察，復原清代驛傳系統的「動態」運轉過程，考察這一系統在清代政治信息傳遞及疆域形成中的作用。

全書由緒論、七個章節及兩個附錄組成。作者在緒論中對古代驛傳研究的學術史做了簡要的回顧，認為學者們在信息控制這一主題上着力甚多，但對於信息的傳遞過程卻較少關注，而高度發達的清代驛傳系統，正為此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範例。作者同時指出，由於中國古代的驛傳體系主要傳送政